范围界定函 # 国内迁移与留守儿童福祉的范围综述—中国 na

Jinkai Li*

比利时根特9000，根特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系。jinkai.li@ugent.be（Jinkai Li）*通讯作者：jinkai.li@ugent.be

摘要：移民子女的福祉正面临与身体、心理和教育风险相关的诸多挑战，这些风险可能阻碍人力资本积累和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农村，由于户籍登记制度的限制，2020年，近900万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务工而缺乏父母照料和监督。本研究通过系统性范围综述，全面梳理相关文献，并总结了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身体、心理（尤其是留守女孩）和教育结果（尤其是留守男孩）的总体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父母双方迁移和母亲迁移都可能加剧留守儿童面临的不利处境。此外，移民汇款以及更多家庭层面和社会支持可能有助于减轻负面影响。最后，我们提出了理论和现实层面的启示，以期为潜在研究方向提供参考。未来仍需开展更多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进行纵向调查，结合中国正在推进的户籍改革，并同时关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

关键词：移民；父母迁移；留守儿童；儿童福祉；中国农村 na

1. 引言

移民几乎占全球总人口的15%，[1], 其中，国内迁移是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迁移不断增长的背景下，移民子女的福祉可能较为脆弱，这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2]。这也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0*（减少不平等）密切相关[3,4]。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迁往城市地区，或从小城市迁往大城市[5]。受家庭财富和社会制度的限制，农村儿童更有可能被父母留在家乡，处于缺乏照料且易受伤害的境地[6]。大量文献表明，父母陪伴和监督

对儿童早期的发展至关重要[7–9]。

户口（中国的户籍制度）为研究父母（在国内）迁移如何影响留守儿童（LBC）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契机。户口制度根据居民出生于农村还是城市，将语文居民划分为两类：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10]。通常，持有农业户口的移民若居住在城市，无法像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例如住房产权、教育和健康服务 [11]。因此，如果父母双方都迁往城市，他们的子女就不得不留在中国农村，由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料 [12]。

尽早确定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发展产生的因果效应至关重要。首先，2014年，有超过6100万儿童因至少一位父母外出而留守。根据中国民政部的报告，2020年，中国农村仍有900万儿童因父母双方外出而留守。其次，大多数留守儿童正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根据“生命最初1000天”理论 [13–15], ，对儿童进行追踪的研究已证实，早期的父母陪伴和投入可能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和非认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16,17]。我们主要开展以下研究工作。首先，我们基于Arksey和O’Malley框架开展范围综述，并梳理33项评估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身体、心理和教育结果总体影响的实证研究。其次，我们阐明父母迁移与留守儿童发展之间复杂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我们提出相关建议并得出结论。

本研究可能在以下方面为现有文献作出贡献。首先，据我们所知，本研究可能是首个同时对留守儿童的身体、心理和教育发展开展系统性范围综述的研究，从而全面、准确地分析留守儿童的福祉。其次，本研究尝试构建父母迁移与留守儿童福祉的理论框架，并同时整合机制分析（汇款、父母养育实践和社会支持渠道）与异质性分析（迁移类型和时间、父母收入和教育程度，以及留守儿童的性别）。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第1节为引言。第2节详细阐述范围综述的方法。第3节从三个方面总结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福祉的总体影响。第4节则提供一个全面的机制和

异质性分析。第 5 节包含结论和启示。

2. 方法

范围综述方法适用于确定具体的研究问题或关键的研究空白 [18,19]。为得出准确的研究结论，我们遵循 Arksey和O'Malley框架 [20], , 该框架主要包括五个步骤：(1) 确定研究问题；(2) 找出与研究问题密切相关的已发表研究；(3) 完善研究选择标准；(4) 总结研究特征；(5) 总结、报告并解读结果。我们依据 PRISMA范围综述（PRISMA-ScR）核对清单 [21] 提供分析结果。

确定研究问题。我们提出以下研究问题：父母迁移如何影响留守儿童的福祉？具体而言，基于儿童福祉的三个领域，我们旨在确定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身体、心理和教育结果的影响。

表1。 检索词

	关键词
身体结局	身高、年龄别身高Z评分、体重、年龄别体重Z评分、体质指数、自评健康、发育迟缓、体重不足、消瘦、贫血、血压、疾病或慢性病
心理结局	行为问题指数、自报心理健康指数、流行病学抑郁评分、社交焦虑指数、抑郁症状、自评幸福感与满意度、大五人格量表、社会情绪评估
教育结果	教育抱负，接受教育程度，标准化英语成绩，言语测验成绩，语文/数学测试分数，期末考试成绩，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认知得分，自我报告的学业能力性能
迁移	父母迁移、父母缺位、国内迁移、移民、城乡迁移
中国	中国农村 , 中国西北部 , 中国农村家庭

识别相关的已发表研究。系统性研究识别在四个同行评审期刊数据库（Science Direct、PubMed、Web of Science 和 Scopus）中进行。检索时段为2014年11月1日至2022年2月1日。检索词由身体结局或心理结局或教育结果、迁移和中国等相关关键词组合而成，如**表1**（检索词）所示。

确定选择标准。文献选择标准如下。首先，所有研究文章均发表于 SCIE/SSCI 收录期刊，涉及健康、教育、心理学、迁移、儿童发展和经济学领域。其次，我关注对0至18岁留守儿童的父母内部迁移影响的定量分析，其中包括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因果推断方法主要包括固定效应、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和双重差分，而相关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线性回归或非线性回归。第三，我关注常用的结局指标，以便比较研究结果并验证其是否一致。结局指标的详细说明见**表1**。第四，我们关注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由于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限制，2020年父母外出务工时，近900万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照料和监督。研究流程图见**图1**。此外，**研究特征总结及详细分析**见第3节（**表2、表3和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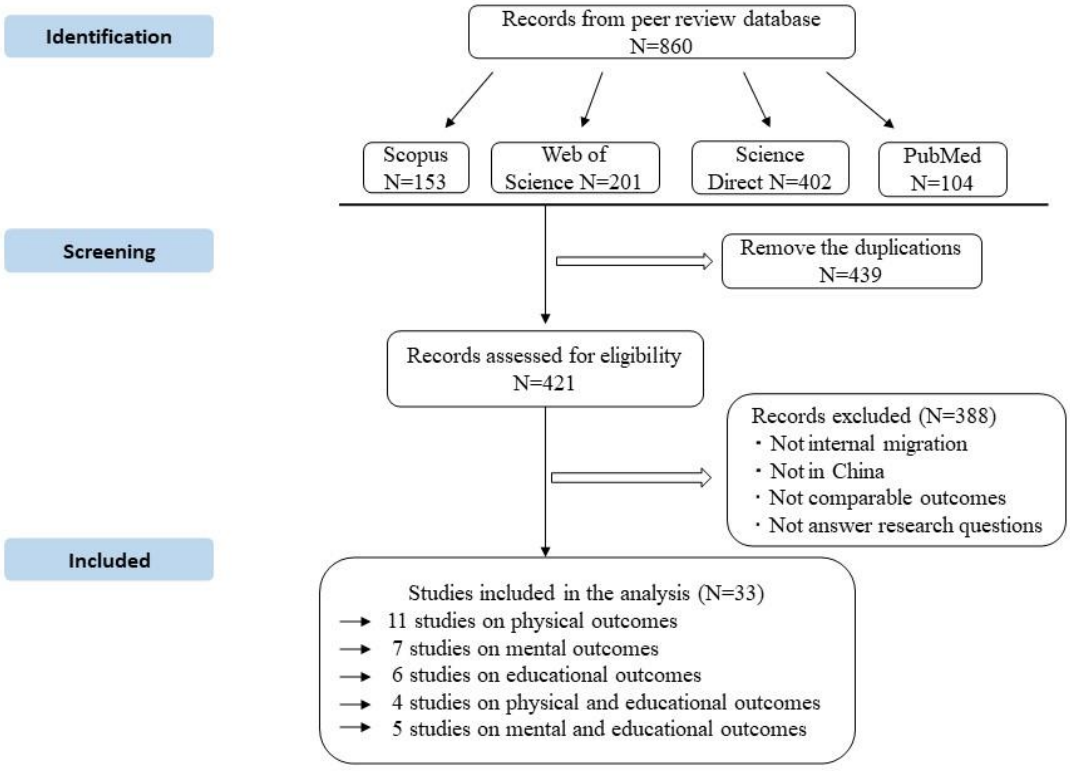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选择流程图

3. 结果

根据对4个收录数据库的研究检索结果，如**图1**所示，共有33项研究入选，

符合范围综述的纳入条件。本节将提供关于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身体、心理和教育结果总体影响的详细实证证据。考虑到可行性，为简化分析并提高准确性，本研究将优先考虑识别策略和数据质量，以尽可能得出准确结论。

3.1. 留守儿童身体结局分析

从**表2**可以发现，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身体结局的影响较为复杂。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情境因素存在差异，例如迁移模式（谁外出迁移以及迁移时间）、儿童的年龄和性别，以及所测量结局的多样性；这些问题将在第4.2节中详细分析。在接下来的有关留守儿童心理和教育结果的部分中，也可能会遇到这些挑战。

另一方面，一些证据表明，父母迁移改善了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流动父母汇款增加这一渠道所致 [22]。具体而言，父亲迁移似乎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父亲迁移的留守儿童在儿童早期营养方面，就发育迟缓、体重不足和贫血风险而言，表现与父母双方都在家的儿童一样好，甚至更好，这或许是父亲汇款产生补偿效应的结果 [23]。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与上述观点相悖。由于缺乏父母养育实践，留守儿童容易患病并出现生长迟缓 [24–28]。总体而言，缺乏父母监督和照料的留守儿童，健康状况更差的可能性更高 [29], ，体重和身高指数也更差 [30]。此外，7-12岁的儿童更容易体重不足，因为留守儿童不得不花更多时间从事农场劳动、做家务和准备饭菜 [12,31]，这是因为家庭缺乏成年劳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先前文献发现的负面影响也可能存在偏差，因为儿童的生长可能在父母迁移前就已迟缓 [32]。此外，也有实证证据表明父母迁移没有影响。一些研究发现，父母迁移与留守儿童的体重或身高 [32–34], 、童年患病 [35], 以及营养状况 [25]无关。

总体而言，因果识别策略（固定效应、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与面板数据相结合，能够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时间不变的不可观测因素。父母迁移会对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Wen 等（2016）、Li 等（2015）和 Meng 等（2017）发现，父母迁移会对留守儿童的血压、患病状况以及身高/体重年龄别 Z 评分产生负面影响，这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表**2.** 留守儿童身体结局的研究特征总结

作者、年份	数据类型	**儿童年龄**	结局	研究设计	主要发现
Mu 等，2015 [33]	两期面板数据	0-9	年龄别体重/身高Z评分	一阶差分估计量 工具变量	对留守儿童体重有正向影响，但没有影响 身高
Wen 等人，2015 [22]	横截面数据	10-17	自评健康	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Logit回归	正向影响
Shi 等人，2020 [23]	横截面数据	6至35个月	发育迟缓/体重不足/消瘦/贫血	广义线性回归 逻辑回归	正向影响
Sun 和 Liang，2021 [36]	横截面数据	7-18	贫血	逆概率治疗加权 估计量	父亲迁移的正向影响 母亲迁移的负向影响
Wen 和 Li，2016 [37]	四期面板数据	7-17	血压	随机效应估计量	负面影响，尤其是母亲迁移或 父母双方迁移
Li 等人，2015 [27]	横截面数据	0-18	疾病和慢性病	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工具 变量	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留守女孩
Meng 等人，2017 [26]	横截面数据	0-15	年龄别身高/体重 Z 评分	工具变量	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留守男孩
Lu 等，2020 [38]	横截面数据	12-16	自我报告的身体健康	有序逻辑回归	负面影响
Lei 等人，2018 [30]	横截面数据	1-15	年龄别身高/体重 Z 评分	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工具变量	负面影响，尤其是在……方面尤为显著。 年幼儿童
Jin 等人，2020 [29]	横截面数据	12-17	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	有序逻辑回归	负面影响
谢等人，2021 [35]	面板数据	1-5	体质指数和疾病	分层线性模型	没有影响
Xu 和 Xie，2015 [39]	横截面数据	10-15	自评健康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量	没有影响
Tian 等人，2017 [32]	面板数据	6-14	体重和身高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量	无影响
Zhang 等人，2015 [24]	面板数据	0-17	体重和身高	生长曲线模型	对女孩没有影响，对男孩有负面影响
Zhou 等人，2015 [34]	横截面数据	3-10	年龄别身高/体重 Z 评分	多元回归分析	没有影响

3.2. 留守儿童心理结局分析

关于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心理结局的影响，根据**表3**中的现有文献，我们可以得出广为接受的结论：父母迁移会产生负面影响。儿童层面的心理结局通常包括抑郁、焦虑、幸福感、问题行为、自尊和非认知能力。总体而言，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更容易受到父母参与、监督和互动缺失的影响。

由于家庭环境提供的支持有所减弱，留守儿童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尤其是与由祖父母或单亲抚养的留守儿童相比，自我监护型留守儿童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40,41]。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留守儿童和青少年往往在心理调适 [42], 、幸福感 [43], 、焦虑 [44], 、孤独感和满意度 [45], 、情绪功能以及社会功能 [46], 方面表现较弱，这可能是由于缺乏亲子沟通与互动，尤其是缺少父母双方或母亲的陪伴所致 [47]。

关于抑郁，留守儿童比父母未迁移的儿童更容易患抑郁症[1]。就迁移者而言，母亲缺席更可能导致儿童出现抑郁症状，而父亲缺席可能并未发挥重要作用[48]。至于留守儿童的非认知能力，通过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大五人格指数[1]可以发现，留守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更为脆弱，这也可以由父母养育实践的缺失，尤其是亲子互动环境的缺失来解释[49]。

总体而言，与既有研究结论相似，无论迁移时长是长期还是短期，父母迁移都可能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非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留守女孩而言。这可能是因为母亲通常承担照顾子女和养活整个家庭的主要责任[50]。

[1] 大五人格模型是衡量儿童非认知能力的有效工具。大五人格主要包括尽责性、外向性、神经质、宜人性和开放性[111]。

表3。 留守儿童心理结局的研究特征汇总

作者、年份	数据类型	儿童年龄	结局	研究设计	主要发现
Lu 等人，2020 [51]	横截面数据	3-15	行为问题指数	结构方程模型	负面影响
Yue 等人，2020 [52]	横截面数据	12-13	抑郁症状	结构方程模型	负面影响
Xu 等人，2019 [48]	两期面板数据	13-16	抑郁症状	固定效应模型 倾向得分加权估计量	母亲单独陪伴时的负面影响 迁移
Wu 和 Zhang，2017 [53]	两期面板数据	10-13	非认知能力	一阶差分估计量	父母双方迁移的负面影响 迁移
Zhao 等人，2017 [54]	横截面数据	10-15	情绪与行为问题	多元线性回归	负面影响
赵和陈，2022 [49]	横截面数据	13-15	大五人格量表	工具变量	负面影响
Wu 等人，2015 [55]	横截面数据	8-17	流行病学抑郁评分	结构方程模型	负面影响
Shi 等人，2016 [44]	两期面板数据	12-13	心理健康评分、社交焦虑和 自尊得分	双重差分估计量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量	负面影响
Shi 等人，2020 [40]	横截面数据	0-3	社会情绪问题	结构方程模型	负面影响
Liu 等人，2021 [50]	两期面板数据	0-3	大五人格量表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量	对母亲长期的负面影响- 运行迁移
Chang 等人，2019 [56]	三期面板数据	14-18	心理健康测验	固定效应模型	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左侧 落后于女孩们
Wang 等人，2019 [57]	三期面板数据	13-16	焦虑和内在动机	固定效应模型	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留守 女童

3.3. 留守儿童教育结果分析

如**表4**所示，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教育结果的影响较为复杂，这可能由两个原因解释：一方面，由于缺乏父母监督，留守儿童通常更容易出现留级或辍学的情况 [58–61]。另一方面，流动父母的汇款能够增加留守儿童的营养和教育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母缺位带来的影响 [62–64]。

在留守儿童的学前阶段，同时经历父母迁移的儿童似乎处于更糟糕的境况，这主要体现在社交技能、执行功能、阅读表现和数学测试成绩方面 [65]。因此，父母双方的缺席会严重阻碍幼儿认知能力的发展 [35,51]。值得注意的是，母亲迁移对留守儿童考试成绩和认知能力的不利影响 [25], 远强于父亲迁移的影响 [48]。另一点是，与青少年相比，年幼儿童可能更容易因父母迁移而遭受创伤 [66], ，这表明儿童在面对困难时比青少年更需要父母照料。

在留守儿童的在校阶段，父母迁移对初中或高中青少年的学业成就 [67] 和学校参与度 [68] 有显著负面影响。此外，当父母双方都迁移，或留守的父母一方是主要照护者时，父母迁移会对考试成绩产生不利影响 [69]。一些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准确测量父母迁移对儿童考试成绩的影响，发现父母双方迁移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70,71], ，这与上述实证证据一致。考虑社区或村庄层面的迁移强度，社区迁出人口越多，留守儿童的语文和数学成绩以及受教育年限就越低 [72]。表5中的大多数文献表明，父母迁移会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表现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留守男孩。

最后，优先采用因果识别策略和面板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有负面影响，尽管汇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补偿效应。第二，大多数文献支持父母迁移会损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这一观点，尤其是留守女孩。第三，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而言，父母迁移总体上会对教育表现和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留守男孩。第四，父母双方迁移会加剧对留守儿童发展的不利影响。

表4。 留守儿童教育结果的研究特征汇总

作者、年份	数据类型	儿童年龄	结局	研究设计	主要发现
Wen等人，2015 [22]	横截面数据	10-17	考试成绩和教育的抱负	有序逻辑回归	正向影响
Bai 等人，2018 [73]	两期面板数据	9-12	标准化英语测试成绩	双重差分估计量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量	正向影响
Lu 等人，2020 [51]	横截面数据	3-15	语言成绩	结构方程模型	父母双方迁移的负面影响
Xie 等人，2019 [72]	横截面数据	10-15	标准化测试成绩 of 词汇和数学	分层线性模型	负面影响
Meng 等人，2017 [26]	横截面数据	7-15	语文和数学考试成绩	工具变量	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留守男孩而言
Xu 等人，2019 [48]	两期面板数据	13-16	期中 test 分数 and 认知测试成绩	固定效应模型 倾向得分加权估计量	仅母亲迁移带来的负面影响
Zhang 等人，2014 [71]	两期面板数据	10-14	期末考试成绩	双重差分估计量 广义矩估计法	父母双方迁移的负面影响
Yue 等人，2020 [25]	四期面板数据	6–30 个月	认知得分	双重差分估计量	较早迁移的负面影响
Wu 和 Zhang，2017 [53]	两期面板数据	10-13	语文和数学考试成绩	一阶差分估计量	父母双方迁移的负面影响
Zhou 等人，2014 [69]	横截面数据	8-17	语文和数学考试成绩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量	父母双方外出后留守男孩受到的负面影响
Zhao 等人，2014 [70]	横截面数据	11-14	标准化数学测试成绩	工具变量 双变量Probit回归	负面影响
Jin 等人，2020 [29]	横截面数据	12-17	自我评估学术表现	有序逻辑回归	没有影响
Chang 等人，2019 [56]	三期面板数据	14-18	数学成绩	固定效应模型	无影响
Zhou 等人，2015 [34]	横截面数据	3-10	考试成绩和辍学率	多元回归分析	无影响
Wang 等，2019 [57]	三期面板数据	13-16	最终数学测试成绩	固定效应模型	没有影响

4. 讨论

为进一步阐明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LBC）的影响，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尝试构建如**图2**所示的理论框架，并进行详细分析：（i）作用机制。汇款效应、父母养育实践以及社会支持的补偿效应等，可能构成调节或缓冲这一因果效应的若干渠道。（ii）异质性。仍有必要进一步揭示，在父母迁移模式和迁移时机、父母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以及儿童性别等异质情境因素下，这一影响将如何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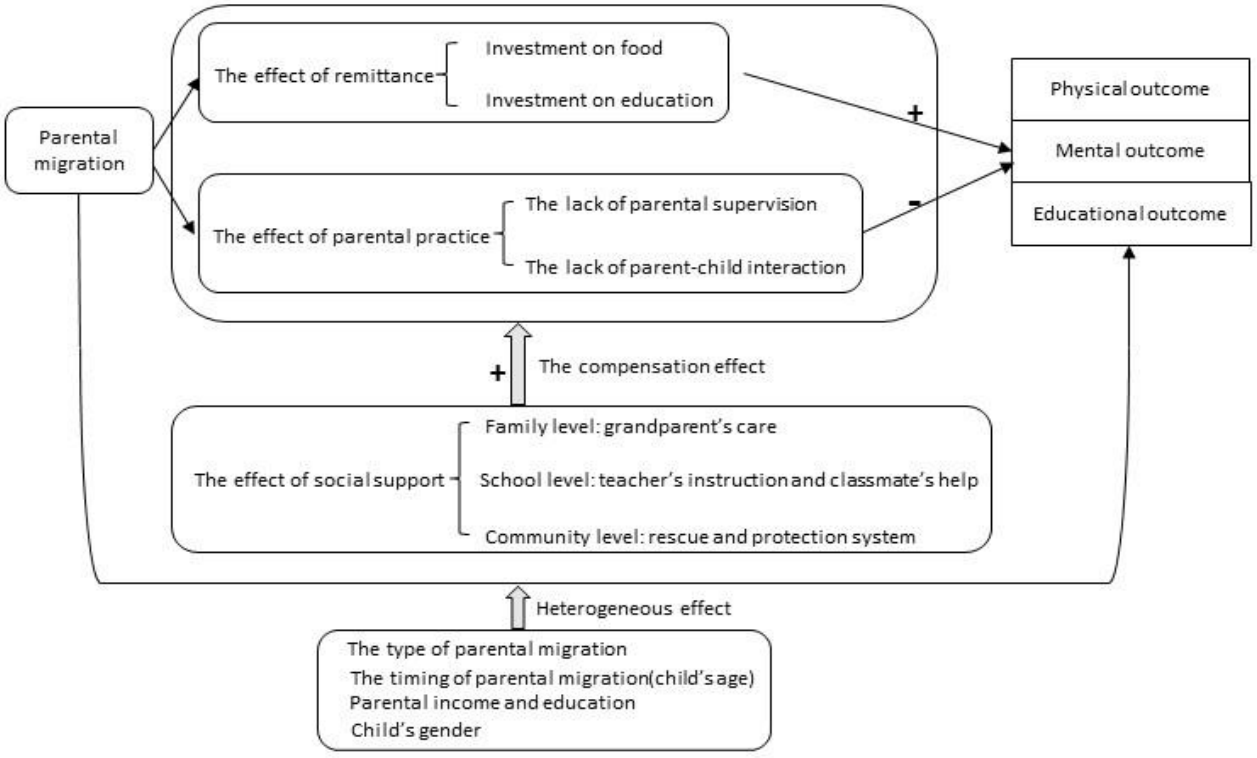

图2.父母迁移与留守儿童福祉之间的理论框架

4.1 机制分析

4.1.1 汇款效应

流动父母的汇款有助于改善留守儿童的营养、教育和心理表现，促进他们的成长 [73–76]。一方面，农村成年人迁往城市工作并因此寄回汇款，从而提高家庭收入。随着家庭预算约束放宽，父母愿意为孩子的食物配方和教育投入更多 [77]。此外，对子女有更高教育期望的流动父母往往会投入更多来】【。

通过汇款获得教育 [73,78]。另一方面，汇款也有助于改善家庭状况 [79], 这对儿童的成长同样至关重要。一项有力的证据是，在中国农村，与完整家庭相比，迁移家庭更有可能用上自来水，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护儿童免受病毒和细菌的侵害 [33]。

4.1.2 父母养育实践的影响

父母养育实践主要包括父母监督以及亲子沟通与互动，这对儿童发展至关重要 [9,80]。因此，父母养育实践的缺失可能会对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 [51]，以及认知与非认知能力[81,82]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与父亲迁移相比 [48], ，母亲较长的迁移时长以及与子女较少的互动可能是对留守儿童不利的因素 [46]。此外，父母监督的缺失通常会导致父母在课后辅导子女学习方面的养育实践减少 [71,83], ，这也会对留守儿童的学业产生负面影响 [49]。此外，一些学者对汇款效应与父母养育实践效应进行了比较，并得出结论：父母缺位效应可能超过汇款效应 [25]。

4.1.3 社会支持的影响

社会支持的作用可以被视为对父母迁移的补偿效应。一般而言，社会支持与青少年发展密切相关。儿童的基本社会需求通过社会支持得到满足，例如来自周围人群和环境的支持 [84,85]。从周围人群的角度来看，家庭中的主要照护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通常是祖父母）、家庭以外的朋友以及学校教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母缺位带来的负面影响 [86,87]。从环境的角度来看，留守儿童的福祉更加依赖于来自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社会支持 [54,88]。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提供了有力证据，表明儿童早期接触周围环境对其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89,90]。尤其是，家庭经济状况和邻里环境在儿童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91]。例如，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父母缺位带来的负面影响 [55]。

4.2 异质性分析

4.2.1 谁迁移的影响：父亲、母亲还是父母双方

父母迁移通常分为三种类型：仅父亲迁移、仅母亲迁移，以及父母双方迁移。这三种模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首先，现有的

文献已经证实，父母双方缺席都会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教育表现产生更严重的负面影响[48,71]。父母双方的陪伴和监督对儿童成长至关重要[92]。由于缺少父母双方的陪伴和照料，对留守儿童心理福祉的不利影响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剧[45,92]。其次，母亲缺席对儿童发展的阻碍可能比父亲缺席更严重[25,36,42]。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母亲照料和亲子互动在儿童大脑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3,94]。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歧视，父亲迁移带来的较大汇款效应可能抵消了父亲迁移的负面影响。男性劳动者通常比女性劳动者收入更高[95],，因此父亲通常是外出务工的首选。

4.2.2 儿童早期的迁移时机

迁移时间是另一个关键因素。从累积优势／劣势理论的角度来看，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的经历，是一个基于初始阶段优势（或劣势）的累积过程[96,97]。既有文献也提供了实证证据，表明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健康的长期影响，在父母于儿童早期迁移的留守儿童身上尤为显著[30,98]。更具体地说，与父母在较晚年龄阶段迁移相比，迁移对24至30个月儿童的因果影响可能更加有害[25]。此外，如果父母在子女年幼时迁移，迁移时长也值得关注。通常，父母迁移时长越长，对留守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就越大[26]。然而，也有相反的证据表明，父母迁移的累积年数并不会影响留守儿童的学校教育[77],，这可能是由其他作用机制所致，例如充足的汇款或祖父母的悉心照料。

4.2.3 父母收入与教育

父母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通常被视为重要的父母层面或家庭层面因素。人们普遍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常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99]。从家庭收入的角度来看，通常有两种解释：第一，家庭收入越高，家庭预算约束越宽松，这可能会降低父母外出务工的动机[100]。因此，父母可以花更多时间陪伴子女，这有利于子女的发展。第二，在收入较高的家庭中，子女能够获得更好的照料和教育，例如营养丰富的食物、优质的早期教育培训和良好的家庭环境，从而极大地

促进儿童的认知和非认知发展 [101,102]。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可能更有可能拥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祖父母，由他们照料孙辈。因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祖父母可能更有能力照看留守儿童，以弥补父母缺位带来的负面影响 [103]。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更有可能对子女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因此愿意在子女的学业上投入更多 [104]。

4.2.4 留守儿童的性别

留守儿童的性别也是一个重要议题[88]。目前，学者们尚未就留守男孩和留守女孩哪一方更容易处于劣势得出明确结论，主要原因是留守儿童各方面结局存在差异。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看，女孩在身高和体重方面比男孩更容易受到影响；如果父母迁移持续时间更长，这种劣势还会加剧[27,32]。从日常行为的角度来看，与留守女孩相比，在缺乏父母监督和管束的情况下，留守男孩吸烟、电子游戏成瘾、不吃早餐和产生自杀意愿的风险更高[43]。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留守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例如抑郁症状和焦虑[41,57]。在教育结果方面，实证证据表明，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只会对男孩的教育表现产生不利影响，而不会影响女孩[69], ，这或许可以用女孩在学习中可能更有耐心和毅力来解释。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在 Arksey和O’Malley框架下，本范围综述分析了33篇研究文章，并收集了实证证据，详细阐明了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身体、心理和教育结局的影响。无论儿童的年龄、性别以及父母迁移模式如何，父母迁移都可能从儿童发展的多个方面损害留守儿童的福祉。值得注意的是，父母双方迁移可能会使留守儿童的处境恶化。在身体结局方面，尽管汇款发挥了补偿作用，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仍会比父母双方陪伴的儿童更差。在心理结局方面，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和非认知发展迟缓，尤其是留守女孩。在教育结局方面，父母迁移会对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学业表现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留守男孩。这些

结论具有启示意义，并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缺乏父母照料和监督的留守儿童的发展。确保留守儿童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0*（减少不平等）[3,4]至关重要。因此，必须确保人们能够充分获得各类公共服务和金融服务，以照料留守儿童，从而改善留守儿童的福祉，缩小移民子女与非移民子女之间的不平等。

5.2 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尝试提出三点启示，或有助于填补未来留守儿童研究的空白。首先，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如何在中国宏观层面的户籍改革背景下，构建大规模、具有代表性的纵向调查数据。这类大规模纵向调查应同时涵盖移民及其原籍家庭成员，尤其应着重收集记录详尽的迁移信息，例如迁移时间、迁移时长，以及迁出和返乡的经历。丰富的数据将为研究者提供更广阔的基础，以了解迁移模式及相关作用机制[105], ，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因果识别的可信度和可行性。

其次，尝试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例如有关迁移的政策，以解决内生性问题。迁移决策可能与结局存在内生关系（即使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之后）[26,70,71]。上述工具变量主要来自气候变化、迁移网络和经济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借鉴一些构建了准自然实验的研究。例如，一项名为太平洋准入类别（PAC）的独特政策引入了移民签证抽签，从汤加申请者中随机选人。这一识别策略巧妙地解决了选择偏差问题，因为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参与者都有同等的迁移意愿[106–108]。然而，似乎很难找到这类准自然实验，这主要取决于实施此类政策的成本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意愿。

第三，同时也有必要更加关注中国的户口改革、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随着户口转换限制逐渐放宽，农民工如今更容易在城市获得户口 [109]。近年来，一个重要趋势是流动儿童的数量逐年增加。流动儿童在城市地区的福祉也值得给予与留守儿童同等程度的关注。目前仍不清楚哪种方式更好。

流动父母的决定：将孩子留在身边还是留在家乡，或带他们一起进城。此外，随着流动儿童数量增加、留守儿童数量略有减少，[110],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能否获得充足的社会支持仍不明确。如何支持迁移家庭中的两类儿童，需要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进一步思考。

资金支持：本研究由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资助编号为 202003250063。
数据可用性声明：不适用。

致谢：作者谨此感谢根特大学 Bart Cockx 教授的宝贵意见。作者在此感谢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提供的资助（202003250063）。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Fellmeth G, Rose-Clarke K, Zhao C, Busert LK, Zheng Y, Massazza A, 等。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影响：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柳叶刀》。2018;392: 2567–2582. doi:10.1016/S0140-6736(18)32558-3 2. Salami B, Fernandez-Sanchez H, Fouche C, Evans C, Sibeko L, Tulli M, 等。非洲移民和难民儿童健康的范围综述。《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2021;18: 3514. doi:10.3390/IJERPH18073514/S1 3. Sachs JD. 从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柳叶刀》。2012;379: 2206–2211. doi:10.1016/S0140-6736(12)60685-0 4. Griggs D, Stafford-Smith M, Gaffney O, Rockström J, Öhman MC, Shyamsundar P, 等。面向人类与地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自然》2013 495:7441。2013;495: 305–307. doi:10.1038/495305a 5. Green wood MJ. 第12章 发达国家的国内迁移。《人口与家庭经济学手册》。1997;1: 647–720. doi:10.1016/S1574-003X(97)80004-9 6. Antman FM. 迁移对留守家庭的影响。《国际迁移经济学手册》。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3。7. Kerns KA, Aspelmeier JE, Gentzler AL, Grabill CM. 儿童中期的亲子依恋与监护。《家庭心理学杂志》。2001;15: 69–81. doi:10.1037/0893-3200.15.1.69 8. Larson R, Richards MH. 儿童晚期和青少年早期的日常陪伴：不断变化的发展背景。《儿童发展》。1991;62: 284–300. doi:10.1111/J.1467-8624.1991.TB01531.X 9. Buhrmester D, Furman W. 陪伴与亲密关系的发展。《儿童发展》。1987;58: 1101. doi:10.2307/1130550 10. Knight J, Deng Q, Li S. 中国农民工短缺与农村劳动力过剩之谜。《中国经济评论》。2011;22: 585–600. doi:10.1016/J.CHIECO.2011.01.006 11. Fu Y, Gabriel SA. 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集聚与中国区域发展。Reg Sci Urban Econ. 2012;42: 473–484. doi:10.1016/J.REGSCIURBECO.2011.08.006 12. Chang H, Dong X yuan, MacPhail F. 劳动力迁移与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及老年人的时间利用模式。World Dev. 2011;39: 2199–2210. doi:10.1016/J.WORLDDEV.2011.05.021 13. Victora CG, Adair L, Fall C, Hallal PC, Martorell R, Richter L, 等。孕产妇和儿童营养不良：对成年健康和人力资本的影响。《柳叶刀》。2008;371: 340–357. doi:10.1016/S0140-6736(07)61692-4 14. Maluccio JA, Hoddinott J, Behrman JR, Martorell R, Quisumbing AR, Stein AD. 改善儿童早期营养对危地马拉成年人教育的影响。《经济学杂志》。2009;119: 734–763. doi:10.1111/J.1468-0297.2009.02220.X 15. Hoddinott J, Maluccio JA, Behrman JR, Flores R, Martorell R. 儿童早期营养干预对危地马拉成年人经济生产力的影响。《柳叶刀》。2008;371: 411–416. doi:10.1016/S0140-6736(08)60205-6 16. Heckman JJ. 技能形成与投资弱势儿童的经济学。Science (1979). 2006;312: 1900–1902.
d
o
i:
1
0.
1
1
26/SCIE
NCE.1128898/ASSET/38F179EC-A959-4FAB-8621-F0B223ADA6D1/ASSETS/GRAPHIC/312 1900 F2.JPEG_ _17. Campbell F, Conti G, Heckman JJ, Moon SH, Pinto R, Pungello E, 等。儿童早期投资可显著改善成年后的健康。Science (1979). 2014;343: 1478–1485.

doi:10.1126/SCIENCE.1248429/SUPPL_FILE/CAMPBELLSM.PDF_ _18. Munn Z, Peters MDJ, Stern C, Tufanaru C, McArthur A, Aromataris E. 系统综述还是范围综述？选择系统综述或范围综述方法时给作者的指南。《BMC医学研究方法学》。2018年；18：1–7。doi:10.1186/S12874-018-0611-X/TABLES/1 19. Peters MDJ, Godfrey CM, Khalil H, McInerney P, Parker D, Soares CB. 开展系统性范围综述的指南。国际循证医疗保健杂志。2015年；13：141–146。doi:10.1097/XEB.0000000000000050 20. Arksey H, O'Malley L. 范围研究：迈向方法学框架。国际社会研究方法学杂志。2005年；8：19–32。21. Tricco AC, Lillie E, Zarin W, O'Brien KK, Colquhoun H, Levac D, et al. 范围综述PRISMA扩展（PRISMA-ScR）：核对清单及说明。《内科学年鉴》。2018年；169：467–473。22. WEN M, Su S, Li X, Lin D. 中国农村的积极青年发展：父母迁移的作用。《社会科学与医学》。2015年；132：261–269。doi:10.1016/J.SOCSCIMED.2014.07.051 23. Shi H, Zhang J, Du Y, Zhao C, Huang X, Wang X. 父母迁移与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幼儿营养之间的关联。BMC公共卫生。2020年；20：1–11。doi:10.1186/S12889-020-8350-4/FIGURES/1 24. Zhang N, Bécares L, Chandola T. 父母迁移的时机是否影响儿童生长？关于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命历程研究。BMC公共卫生。2015年；15：1–12。doi:10.1186/S12889-015-2296-Y/FIGURES/4 25. Yue A, Bai Y, Shi Y, Luo R, Rozelle S, Medina A, et al. 父母迁移与中国农村儿童早期发展。《人口学》。2020年；57：403–422。doi:10.1007/S13524-019-00849-4 26. Meng X, Yamauchi C. 移民子女：父母迁移对中国儿童教育与健康结局的累积影响。《人口学》。2017年；54：1677–1714。doi:10.1007/S13524-017-0613-Z 27. Li Q, Liu G, Zang W.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中国经济评论》。2015年；36：367–376。doi: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15.04.004 28. Zhang Y, Zheng X. 国内迁移与儿童健康：中国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健康差异的调查。《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2022年；17：e0265407。doi:10.1371/JOURNAL.PONE.0265407 29. Jin X, Chen W, Sun IY, Liu L. 身体健康、学业表现与违法行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比较研究。《儿童虐待与忽视》。2020年；109：104707。doi:10.1016/j.chiabu.2020.104707 30. Lei L, Liu F, Hill E. 劳动力迁移与中国留守儿童健康。《发展研究杂志》。2018年；54：93–110。doi:10.1080/00220388.2017.1283015/SUPPL FILE/FJDS A 1283015 SM9773.DOCX _ _ _ _31. de Brauw A, Mu R. 迁移与中国农村儿童超重和体重不足状况。《食品政策》。2011年；36：88–100。doi:10.1016/J.FOODPOL.2010.08.001 32. Tian X, Ding C, Shen C, Wang H. 父母迁移是否会对留守儿童的生长产生负面影响？——来自中国农村纵向数据的新证据。《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2017年；14：1308。doi:10.3390/IJERPH14111308 33. Mu R, de Brauw A. 迁移与幼儿营养：中国农村的证据。《人口经济学杂志》2015年28卷3期。2015年；28：631–657。doi:10.1007/S00148-015-0550-3 34. Zhou C, Sylvia S, Zhang L, Luo R, Yi H, Liu C, et al. 中国留守儿童：父母迁移对健康、营养和教育结果的影响。《卫生事务》。2015年；34：1964–1971。

doi:10.1377/hlthaff.2015.015035. Xie W, Sandberg J, Uretsky E, Hao Y, Huang C. 父母迁移与儿童早期发展：中国儿童前瞻性队列研究。《人口研究与政策评论》。2021年；1–30。doi:10.1007/s11113-020-09626-3 36. Sun F, Liang Z. 父母迁移与中国儿童贫血状况。《社会科学与医学》。2021年；270：113680。doi:10.1016/J.SOCSCIMED.2021.113680 37. WEN M, LI K. 父母及兄弟姐妹迁移与中国农村儿童高血压。生物社会科学杂志。2016年；48：129–142。doi:10.1017/S002193201500005X 38. Lu W, Zhang A, Mossialos E. 父母迁移与中国青少年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一项横断面研究。EClinicalMedicine。2020年；22：100371。doi:10.1016/J.ECLINM.2020.100371 39. Xu H, Xie Y. 农村向城市迁移对中国儿童福祉的因果效应。欧洲社会学评论。2015年；31：502–519。doi:10.1093/esr/jcv009 40. Shi H, Zhao C, Dou Y, Duan X, Yang L, Du Y, et al. 父母迁移如何影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早期社会情绪发展：一项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国际公共卫生杂志。2020年；65：1711–1721。doi:10.1007/S00038-020-01509-W/FIGURES/3 41. Zhao F, Yu G. 父母迁移与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基于心理健康测验的荟萃分析。儿童与家庭研究杂志。2016年；25：3462–3472。doi:10.1007/S10826- 016-0517-3/TABLES/2 42. Chen M, Sun X, Chen Q, Chan KL. 父母迁移、儿童安全与中国农村儿童的心理适应：一项荟萃分析。创伤、暴力与虐待。2020年；21：113–122。doi:10.1177/1524838017744768 43. Gao Y, Li LP, Kim JH, Congdon N, Lau J, Griffiths S. 父母迁移对中国留守学龄青少年健康状况及健康行为的影响。BMC公共卫生。2010年；10：1–10。doi:10.1186/1471-2458-10-56/TABLES/4 44. Shi Y, Bai Y, Shen Y, Kenny K, Rozelle S. 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国西北部的证据。《中国与世界经济》。2016年；24：105–122。doi:10.1111/CWE.12161 45. Su S, Li X, Lin D, Xu X, Zhu M.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适应：父母迁移与亲子沟通的作用。儿童保育、健康与发展。2013年；39：162–170。doi:10.1111/J.1365-2214.2012.01400.X 46. Huang Y, Zhong XN, Li QY, Xu D, Zhang XL, Feng C, et al.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或青少年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一项横断面研究。健康与生活质量结果。2015年；13：1–10。doi:10.1186/S12955-015-0220-X/TABLES/6 47. el Nokali NE, Bachman HJ, Votruba-Drzal E. 父母参与与小学阶段儿童的学业与社会发展。《儿童发展》。2010年；81：988–1005。doi:10.1111/J.1467- 8624.2010.01447.X 48. Xu Y, Xu D, Simpkins S, Warschauer M. 哪位家长缺席是否重要？中国的劳动力迁移、育儿与青少年发展。儿童与家庭研究杂志。2019年；28：1635–1649。doi:10.1007/S10826-019-01382-Z 49. Zhao C, Chen B. 父母迁移与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非认知能力：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的因果效应。《儿童虐待与忽视》。2022年；123：105389。doi:10.1016/J.CHIABU.2021.105389

50. Liu H, Chang F, Corn H, Zhang Y, Shi Y. 父母迁移对中国西北部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亚洲经济学杂志》。2021年；72：101261。doi:10.1016/j.asieco.2020.101261 51. Lu Y, Yeung WJJ, Treiman DJ. 父母迁移与中国儿童的心理与认知发展：差异及中介机制。《中国社会学评论》。2020年；52：337–363。doi:10.1080/21620555.2020.1776600/SUPPL FILE/MCSA A 1776600 SM8087.DOCX_ _ _ _52. Yue Z, Liang Z, Wang Q, Chen X. 父母迁移对儿童抑郁的影响：中国农村的新证据。《中国社会学评论》。2020年；52：364–388。doi:10.1080/21620555.2020.1776601 53. Wu J, Zhang J. 父母缺位对中国农村儿童发展的影响。《亚洲经济政策评论》。2017年；12：117–134。doi:10.1111/AEPR.12166 54. Zhao C, Wang F, Li L, Zhou X, Hesketh T. 父母迁移对中国儿童心理社会福祉的长期影响：缓解因素与加剧因素。《社会精神病学与精神流行病学》。2017年；52：669–677。doi:10.1007/S00127-017-1386-9/TABLES/4 55. Wu Q, Lu D, Kang M. 父母迁移经历不同的中国农村儿童的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社会科学与医学》。2015年；132：270–277。doi:10.1016/J.SOCSCIMED.2014.10.050 56. Chang F, Jiang Y, Loyalka P, Chu J, Shi Y, Osborn A, et al. 父母迁移、教育成就与中国农村初中生的心理健康。《中国经济评论》。2019年；54：337–349。doi:10.1016/J.CHIECO.2019.01.007 57. Wang L, Zheng Y, Li G, Li Y, Fang Z, Abbey C, et al.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成就与心理健康：关于父母迁移的因果研究。《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19年；11：569–582。doi:10.1108/CAER-09-2018-0194/FULL/XML 58. Fan X, Chen M. 父母参与与学生学业成就：荟萃分析。《教育心理学评论》2001年 13:1。2001年；13：1–22。doi:10.1023/A:1009048817385 59. Porumbu D, Necşoi DV. 父母参与/态度与儿童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社会与行为科学程序汇刊》。2013年；76：706–710。doi:10.1016/J.SBSPRO.2013.04.191 60. Sui-Chu EH, Willms JD. 父母参与对八年级学业成就的影响。《社会学与教育》。1996年；69：126–141。doi:10.2307/2112802 61. Edwards AC, Ureta M. 国际移民、汇款与学校教育：来自萨尔瓦多的证据。《发展经济学杂志》。2003年；72：429–461。doi:10.1016/S0304-3878(03)00115-9 62. Lu Y. 父母迁移与留守儿童教育：两个情境的比较。《婚姻与家庭杂志》。2014年；76：1082–1098。doi:10.1111/JOMF.12139 63. Acharya CP, Leon-Gonzalez R. 迁移和汇款如何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放宽信息与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发展研究杂志》。2014年；50：444–460。doi:10.1080/00220388.2013.866224/SUPPL FILE/FJDS A 866224 SM4845.PDF _ _ _ _64. Rapoport H, Docquier F. 第17章：移民汇款经济学。《赠与、利他主义与互惠经济学手册》。2006年；2：1135–1198。doi:10.1016/S1574- 0714(06)02017-3 65. Hu BY, Wu H, Winsler A, Fan X, Song Z. 父母迁移与中国农村学龄前儿童早期学业与社会技能发展轨迹：“留守”儿童真的被落下了吗？《幼儿研究季刊》。2020年；51：317–328。doi:10.1016/j.ecresq.2019.12.011 66. Lu Y.《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婚姻与家庭杂志》。2012年；74：

328–341。doi:10.1111/J.1741-3737.2011.00951.X 67. Li L, Wang L, Nie J. 父母迁移对中国农村留守初中生学业表现的影响。《中国与世界经济》。2017年；25：45–59。doi:10.1111/CWE.12193 68. Wen M, Lin D. 中国农村儿童发展：被流动父母留在身边以外的儿童与非流动家庭的儿童。儿童发展。2012年；83：120–136。doi:10.1111/J.1467-8624.2011.01698.X 69. Zhou M, Murphy R, Tao R. 父母迁移对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人口与发展评论》。2014年；40：273–292。doi:10.1111/J.1728-4457.2014.00673.X 70. Zhao Q, Yu X, Wang X, Glauben T. 父母迁移对中国农村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中国经济评论》。2014年；31：43–54。doi:10.1016/J.CHIECO.2014.07.013 71. Zhang H, Behrman JR, Fan CS, Wei X, Zhang J. 父母缺位会降低认知成就吗？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发展经济学杂志》。2014年；111：181–195。doi:10.1016/J.JDEVECO.2014.09.004 72. Xie W, Sandberg J, Huang C, Uretsky E. 留守村庄，留守儿童：迁移与中国农村儿童的认知成就。《人口、空间与地方》。2019年；25。doi:10.1002/PSP.2243 73. Bai Y, Zhang L, Liu C, Shi Y, Mo D, Rozelle S. 父母迁移对中国西北部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发展研究杂志》。2018年；54：1154–1170。doi:10.1080/00220388.2017.1333108/SUPPL FILE/FJDS A 1333108 SM4180.PDF _ _ _ _74. Pan Z, Xu W, Wang G, Li S, Yang C. 汇款会抑制还是增加移民输出地区的家庭收入？中国农村汇款影响的模型分析。《中国经济评论》。2020年；61：101452。doi:10.1016/j.chieco.2020.101452 75. Pan Z, Dong W. 金钱能否弥补成年子女的缺位？衡量汇款对农村移民留守父母健康的补偿效应。《农村研究杂志》。2020年；79：216–225。doi:10.1016/j.jrurstud.2020.08.022 76. Amuedo-Dorantes C, Pozo S. 核算汇款和迁移对儿童学校教育的影响。《世界发展》。2010年；38：1747–1759。doi:10.1016/J.WORLDDEV.2010.05.008 77. Dong Y, Wang W, Li S, Zhang L. 父母迁移对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学校教育的累积影响。《农村研究杂志》。2021年；86：527–541。doi:10.1016/J.JRURSTUD.2021.07.007 78. Alcaraz C, Chiquiar D, Salcedo A. 墨西哥的汇款、学校教育与童工。《发展经济学杂志》。2012年；97：156–165。doi:10.1016/J.JDEVECO.2010.11.004 79. Evans GW. 儿童发展与物理环境。《心理学年度评论》。2006年；57：423–451。80. Fingerman K, Miller L, Birditt K, Zarit S. 给予亲人和有需要者：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支持。《婚姻与家庭杂志》。2009年；71：1220–1233。doi:10.1111/J.1741-3737.2009.00665.X 81. Jingzhong Y, Lu P. 差异化的童年：农村劳动力迁移对中国留守儿童的影响。《农民研究杂志》。2011年；38：355–377。82. Guo J, Ren X, Wang X, Qu Z, Zhou Q, Ran C, et al. 中国移民儿童与留守儿童的抑郁及其与亲子、师生关系质量的关联。《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2015年；10：e0145606。doi:10.1371/JOURNAL.PONE.0145606

83. Wang L, Mesman J. 中国农村向城市迁移背景下的儿童发展：一项元分析综述。《心理科学展望》。2015年；10：813–831。doi:10.1177/1745691615600145 84. Jacobson DE。社会支持的类型与时机。《健康与社会行为杂志》。1986年；27：250–264。doi:10.2307/2136745 85. Cobb S。社会支持对生活压力的调节作用。《心身医学》。1976年；38：300–314。doi:10.1097/00006842-197609000-00003 86. Dolbin-MacNab ML, Yancura LA。祖父母抚养孙辈的国际视角：推进全球论述的背景考量。《国际老龄化与人类发展杂志》。2018年；86：3–33。doi:10.1177/0091415016689565 87. Robila M。罗马尼亚的父母迁移与儿童结局。《儿童与家庭研究杂志》。2011年；20：326–333。88. Chang H, Yan Q, Tang L, Huang J, Ma Y, Ye X, et al。中国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自杀未遂的比较分析。《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2017年；12：e0178743。doi:10.1371/JOURNAL.PONE.0178743 89. Chetty R, Hendren N, Katz LF。接触更优邻里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来自“迁居以改善机会”实验的新证据。《美国经济评论》。2016年；106：855–902。doi:10.1257/AER.20150572 90. Renzaho AMN, Dachi G, Tesfaselassie K, Abebe KT, Kassim I, Alam Q, et al。评估冲突重灾区南苏丹社区综合管理重度消瘦项目的影响：营养紧急响应项目可扩展性的多维方法。《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2021年；18：9113。doi:10.3390/IJERPH18179113/S1 91. Zhou Q, Guo S, Lu HJ。中国农村儿童的福祉与健康：父母缺位、经济状况和邻里环境的作用。《应用生活质量研究》。2021年；16：2023–2037。doi:10.1007/S11482-020-09859-6/FIGURES/1 92. Seltzer JA, Bianchi SM。儿童与缺位父母的联系。《婚姻与家庭杂志》。1988年；663–677。93. Luby JL, Belden A, Harms MP, Tillman R, Barch DM。学前期是母亲支持影响海马体发展轨迹的敏感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16年；113：5742–5747。doi:10.1073/PNAS.1601443113/-/DCSUPPLEMENTAL 94. Luby JL, Barch DM, Belden A, Gaffrey MS, Tillman R, Babb C, et al。儿童早期的母亲支持可预测学龄期更大的海马体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12年；109：2854–2859。doi:10.1073/PNAS.1118003109 95. Chen Z, Ge Y, Lai H, Wan C。全球化与中国性别工资不平等。《世界发展》。2013年；44：256–266。doi:10.1016/J.WORLDDEV.2012.11.007 96. DiPrete TA, Eirich GM。累积优势作为不平等机制：理论与实证进展综述。《社会学年度评论》。2006年；32：271–297。97. Dannefer D。累积优势/劣势与生命历程：年龄理论与社会科学理论的交叉融合。《老年学杂志：B辑》。2003年；58：S327–S337。doi:10.1093/GERONB/58.6.S327 98. Antman FM。国际移民与留守儿童中的性别歧视。《美国经济评论》。2011年；101：645–49。doi:10.1257/AER.101.3.645 99. Bradley RH, Corwyn RF。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发展。《心理学年度评论》。2002年；53：371–399。100. Goss EP, Paul C。迁移决策中的年龄与工作经验。《人力资源杂志》。1986年；21：397。

doi:10.2307/145970101. Duncan GJ, Magnuson K, Votruba-Drzal E。增加家庭收入以促进儿童发展。Future Child。2014年；99–120。102. Blau DM。收入对儿童发展的影响。Rev Econ Stat。1999年；81：261–276。doi:10.1162/003465399558067 103. Crosnoe R, Elder GH。生命历程转变、代际利害关系与祖孙关系。《婚姻与家庭杂志》。2002年；64：1089–1096。doi:10.1111/J.1741-3737.2002.01089.X 104. Steelman LC, Powell B。支持下一代：父母对高等教育的支付意愿。《美国社会学杂志》。1991年；96：1505–1529。105. Certo ST, Semadeni M。战略研究与面板数据：证据与启示。J Manage。2006年；32：449–471。106. Gibson J, Mckenzie D, Stillman S。国际移民对留守家庭成员的影响：来自移民抽签项目的综合结果。Rev Econ Stat。2011年；93：1297–1318。doi:10.1162/REST A 00129_ _107. Gibson J, McKenzie D, Stillman S。估计移民迁出对移民输出地区收入与贫困的影响时，控制选择性与持续时间依赖异质性。Econ Dev Cult Change。2013年；61：247–280。108. McKenzie D, Rapoport H。迁移会降低受教育程度吗？来自墨西哥的证据。J Popul Econ。2011年；24：1331–1358。doi:10.1007/S00148-010-0316-X/TABLES/8 109. Zhang H。户籍制度对中国城市农民工职业流动性的限制。《中国经济评论》。2010年；21：51–64。doi:10.1016/J.CHIECO.2009.10.002 110. Hu H, Gao J, Jiang H, Jiang H, Guo S, Chen K, et al。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行为问题的比较研究。《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2018年，第15卷，第655页。2018年；15：655。doi:10.3390/IJERPH15040655 111. Digman JM。大五人格的高阶因素。J Pers Soc Psychol。1997年；73：1246。